

NONG

YE

XUE

DA

ZHAI

YUN

DONG

SHI

农业学大寨运动史



李静萍◎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农业学大寨运动史

李静萍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业学大寨运动史/李静萍著.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

ISBN 978-7-5073-3253-7

I. ①农… II. ①李… III. ①农业学大寨

—史料 IV. ①D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6760号

农业学大寨运动史

著 者:李静萍

责任编辑:刘庆旻

特邀校对:刘 东 等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一号

邮 编:100017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710 × 1000mm 16开 28印张 490千字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73-3253-7 定价:5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前 言

本书是一部系统研究农业学大寨运动史的书。研究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从研究陈永贵开始的。最初是2003年由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同志提议的。他在听取山西省史志研究院李茂盛同志汇报工作时，提议认真研究一下陈永贵这个人物。当时，茂盛同志分管党史所和当代山西所两个所的工作，担纲《中共山西历史》和《当代山西史》的编写任务，工作很忙，实在腾不出时间，便把这项任务移转到我手中。我对陈永贵是怀着敬佩之心研究的。从孩提时代我就听说过陈永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心为公克己奉献的故事。在乡村，他是家喻户晓的著名劳模，在中央，他是扎白毛巾的副总理，我打心眼里佩服他。当然，并不是说他没有错误，他在农业学大寨后期确实推行过一些不切实际的做法，包括制度框架内的“左”的做法。但他身上所展现的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实在令人感佩。我从2005年开始大量收集有关陈永贵的资料，专心致志地投入写作，越接触越有兴趣，越研究越觉得有价值，一气完成了约30万字的《陈永贵传》，由当代中国出版社于2009年正式出版。在撰写《陈永贵传》的过程中，我逐步萌发了研究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念头，并于2006年开始一边撰写《陈永贵传》，一边地毯式收集有关农业学大寨的档案文献资料。

农业学大寨运动纵跨“文革”前、“文革”中和“文革”后三个时期，长达16年之久。它先是一场为发展农业生产而发动



的学习大寨先进典型、以治山治水和开滩造田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生产运动，那时虽然受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环境影响，带有一些政治色彩，但主体还是发展农业生产。后学大寨运动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捆绑在一起，发展成用阶级斗争的办法巩固所谓的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政治运动，此时的学大寨运动，伴随着“文革”节拍，渐次陷入“文革”泥潭，深受“文革”影响，甚至完全被“文革”绑架，虽然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农业生产，农业生产仍是其基础，但从主导舆论看，显然是想用政治强制的手段维持人民公社集体化体制，用斗争哲学注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对如此漫长、如此曲折的运动进行深入的研究、具体的分析、科学的抽象和高度的概括，是一项艰苦而细致的工作，其难度不言而喻。为了客观全面地总结记述这段轰轰烈烈、古今罕见又令人难以释怀的历史，我先后到国家和省级档案馆、图书馆查阅了数以千万字的文献档案和图书报刊资料，也走访了不少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亲历者。经过深入研究，全面了解，形成基本构架以后，于2008年6月开始着手撰写。

在撰写过程中，我始终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没有档案佐证的事宁愿不写，没有历史依据的话宁愿不说；始终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把每一件事都放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去考察，努力还原历史原貌。

今年是农业学大寨运动结束30周年，我谨以此书献给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流血流汗的广大农民，献给为新中国农业发展作出贡献的人们。

著者

2010年10月1日于太原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农业学大寨的缘起	1
第一节 七亿人口大国粮食短缺的现实要求	2
第二节 共和国领袖未来理想社会的必然选择	17
第三节 大寨典型的神奇力量	30
第二章 农业学大寨的发动	46
第一节 山西发现大寨典型	46
第二节 大寨业绩传遍中国	56
第三节 大寨先进事迹引起中央重视	63
第四节 廖鲁言大寨调查	66
第五节 大寨精神的生成	72
第六节 周恩来向全国发出学习大寨的号召	74
第七节 毛泽东宴请陈永贵	76
第八节 “农业学大寨”原句的来历	78
第三章 各地学大寨的热潮	84
第一节 各地贯彻学大寨精神	84
第二节 一大批大寨式农业典型的涌现	102
第三节 三次全国农业展览	136



第四节	学大寨热潮的环境、主线和特点	144
第四章	学大寨运动走向歧途	168
第一节	大寨成为政治典型	168
第二节	大寨经验的异化	182
第三节	昔阳建成大寨县	195
第四节	全国同念一本经	207
第五节	大寨成为朝圣地	218
第五章	稳定农业生产的努力	227
第一节	中央察觉“左”的错误	227
第二节	农业领域初步纠“左”的努力	230
第三节	纠“左”的反复	246
第六章	“普及大寨县”运动	251
第一节	山西率先推行普及大寨县	251
第二节	第一次全农会	260
第三节	第二次全农会	274
第四节	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	280
第五节	脱离实际的工程	294
第六节	超越生产力的过渡	309
第七节	弄虚作假的“大寨县”	319
第八节	荒唐的行行业业学大寨	325
第七章	学大寨运动的终结	342
第一节	初现抵制之声	342
第二节	地方党报的“反击”	348
第三节	围绕《六十条》的争论	357
第四节	引发高层质疑	362
第五节	中央工作会议再争论	369

第六节	公开批评学大寨运动	376
第七节	山西被迫反思	397
第八节	中央郑重批示	416
第八章	后大寨时期	420
第一节	学大寨运动的余波	420
第二节	学大寨典型的怀旧心情	428
第三节	大寨精神的永恒影响	433
第四节	历史地看待学大寨运动	435
后 记	439

第一章 农业学大寨的缘起

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以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变山区落后面貌为典型而发动的一场旨在探索农业发展道路、解决人口大国的人民生存与经济发展问题的群众性运动。这场运动从1964年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结束，前后纵跨“文革”前、“文革”中和“文革”后三个时期，影响中国农村、农业、农民发展达16年之久。这场规模空前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最初是以改天换地、劈山造田、基本农田建设、精耕细作、科学种田为主要内容的，对全国各地农村形势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提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场运动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发生了“左”的偏向，大寨由生产典型蜕变为政治典型^①，于是在“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的口号下，大寨经验、大寨做法附加了许多“左”的色彩，农业学大寨运动也随之失去了它原有的发展生产的价值，走上了歧途，最终没能解决农业的发展问题和七亿人的吃饭问题。

然而，农业学大寨运动毕竟是新中国历史上农村运动中持续时间最长、参加人数最多、涉及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一场全国性运动。它的兴起和“文革”开始后的畸形发展，不仅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而且在中国当代历史上都产生了既大且深的影响。为此，研究这一运动的缘起、发动、高潮、转向和终结，都有着重要的历史认知意义和现实借鉴意义。

农业学大寨运动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动的，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产物，其原因是极其深刻和复杂的。这种深刻复杂的原因，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考察。

^①1980年8月24日，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中表述为“农业战线上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



第一节 七亿人口大国^①粮食短缺的现实要求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一个耕地相对不足的国家。耕地相对不足和粮食短缺是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软肋。解决七亿人的吃饭问题需要粮食，支持工业化建设需要粮食，供养几百万军队需要粮食，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需要粮食。认识到自身的弱点，认识到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是建国后执政的共产党人的远见卓识。因为只有解决粮食的短缺问题，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解决数亿人口的吃饭问题 是执政的共产党人面临的首要任务

近代以来，由于社会制度落后、战乱频仍和无力抵御的自然灾害，中国近百年间经济发展迟缓，整体发展水平落后，农业的凋敝尤为严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整个农业同抗战前相比，各项主要指标都降到了最低点，粮食总产量仅为11318万吨，相当于抗战前1936年水平的75.5%，人均占有粮食仅为209公斤^②，棉花、花生、油菜籽和黄红麻减少1/2到1/3不等，大牲畜和猪羊也大量减少，水产品减少2/3以上^③，而且贫富不均、粗精失衡，饥饿笼罩全国。

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很差，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很小，农业人口占80%多，城市的生产又有50%依附农业。农业的极度残破使五亿四千万人口的吃饭问题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首先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949年8月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中，这样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纪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堪负担的压力。（近代史上）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是成功的。”“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中共宣传的内容，

①1964年我国人口7.05亿。

②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167、168页。

③《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农业》，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36页。

一大部分是他们决心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①他甚至预言，共产党政权也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必然会因此而垮台。尽管毛泽东当年在一篇文章中狠狠地回击了艾奇逊，但不争的事实是，当时贫困与饥饿普遍存在于中华大地，吃饭问题确是中国政府的一大难题。发展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成为中共执政后的第一要务。

建国伊始，满目疮痍，百废待举，百业待兴，既有繁重的政治任务，又有严重的恢复生产的经济任务，但恢复和发展生产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更是当务之急。深谙中国国情的毛泽东深知农业的重要性，早在1934年1月《我们的经济政策》报告中，他就曾指出：“我们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②新中国成立后，农业被摆在了经济建设的突出位置，向贫困宣战，向饥饿宣战成为党和政府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1949年12月8日至20日，中央人民政府即召开了全国农业生产会议。会议的中心任务是增产粮食和棉花，以解决人民食粮和工业原料的燃眉之急。农业部部长李书城分析了1950年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和可能发生的困难，提出1950年农业生产方针以恢复为主，要求老解放区的农业生产水平比1949年提高一成，新解放区则保持1949年的生产水平，条件较好的地区争取略加提高。粮食在已有水平上要增产500万吨，皮棉增产24万吨。

1949年12月22日和23日，周恩来接连两天对出席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的代表们讲话，明确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论断。他说，国家现在负担很大，不抓生产不行。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当前生产任务的重心是恢复而不是发展。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在谈到农业和工业的关系时，周恩来强调：“如果没有广大农业的发展，工业发展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③

为贯彻落实这次全国农业会议精神，1951和1952年，政务院又陆续下达了关于本年度农业生产的决定，提出了年度农业生产的总要求和总目标。如《关于一九五二年农业生产的决定》即明确提出：1952年农业生产总的要求是

①《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1944~1949年时期》，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1957年9月。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16页、117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976页。



达到并超过抗战前的最高水平，要求粮食增长 8%，棉花增长 20%，茶、丝、水果及家畜、水产等产品均应努力增产，提高质量。

然而，如何解决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如何提高粮食产量？仅有政府制定的增产计划是远远不够的，它一方面需要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需要政府下大力气扶持农业生产，从政策层面和技术层面上促进农民增产增收。为此，变革新区农业生产关系和发展农业生产力成为党和政府着手解决粮食问题的两个重拳。

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党和政府一面抓紧进行新区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改变了几千年来的土地占有状况，使翻身做主人的中国农民以前所未有的热忱忘我地投入到了农业生产中。另一面又根据我国农业生产实际，不断有针对性地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如：要求农业生产以发展粮食和棉花为中心、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目标，实行合理负担的农业税收政策，增加农用资金、物资的供应，调整农产品收购价格，进行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进和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组织开垦荒地，开展互助合作和爱国丰产运动等等。

政府的扶持和鼓励，农民的实干和苦干，换来了农业生产突飞猛进的发展。粮食产量 1950 年上升为 13213 万吨，1951 年为 14369 万吨，1952 年为 16392 万吨，超过历史最高年份水平 9.3%，3 年间增加 5074 万吨。棉花产量 1949 年为 44.4 万吨，1950 年达到 69.2 万吨，1951 年为 103.1 万吨，1952 年为 130.4 万吨，超过历史最高年份水平 53.6%。^①

二、两次粮食危机连续向共产党人敲响粮荒的警钟

虽然到 1952 年底，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得以完成，全国工农业生产均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粮食连年丰收，但人均拥有粮食量并不多。1952 年我国每人每年只有 288 公斤粮食，而处于北温带跨寒带历来粮食紧缺的苏联平均每人每年则达 650 公斤^②。从供求关系上看，产需矛盾并未得到根本缓解。“粮食的紧张情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能完全避免的。……

^①数字源于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198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 年，第 141 页、142 页、168 页。

^②中共中央宣传部：《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1953 年 12 月。

粮食生产增长一分，粮食紧张的情况就可以缓和一分。”^①1953年秋，这一矛盾进一步突显，出现了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粮食危机，主要表现为粮食严重短缺，国家直接掌握的粮食急剧减少，粮食供求矛盾尖锐，源于1952年9月在河南、江苏、江西等省相继出现的抢购粮食现象到1953年继续发展。据粮食部1953年6月2日向中央的报告和该部负责人稍后向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的介绍：在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共收入粮食2735万吨，比上年增长8.9%；支出2935万吨，比上年增长31.6%，收支相抵，赤字200万吨。6月30日的粮食库存将由上年同期的725万吨减为525万吨。全国财经会议的粮食组集中讨论粮食供销形势后得出的结论是：问题很大，办法不多，真有点难以为继。^②

造成1953年粮食危机的原因主要有：

一是城镇人口的增加，使城乡粮食供应面迅速扩大。1953年是我国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第一年，也是国家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我国城镇人口迅速增加，1953年达7826万人，比1952年的7163万人增加663万，比1949年的5765万人增加2061万。^③1949、1952、1953年初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分别为10.6%、12.5%和13.3%。

二是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自身对粮食的消费量也与日俱增。据统计，1949年，农村人均消费粮食185公斤，1953年增加到220公斤。同时，从农民消费粮食的结构上看，也在发生由粗到精的变化。薄一波曾在1953年对华北农村作了几十天的调查，他在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十顿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这是国家收购小麦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④这样，由于农村自给性消耗增多，公粮和商品粮所占比例自然相应降低。1951~1952年度公粮和国家从市场上收购的粮食占粮食总量的28.2%，1952~1953年度这一比重下降到25.7%。^⑤

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1953年3月3日。

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55-256页。

③数字源于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第6页。

④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57页。

⑤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57页。



三是流通渠道不畅。当时，我国的粮食交易存在着两种渠道：自由市场渠道和计划渠道。国营粮食有行政手段保障，逐步发展壮大，并取得了粮食市场的领导地位。私营粮食商业在全国财经统一、物价基本稳定之后就发生了困难。经过1951年底和1952年初的“三反”、“五反”运动，私营粮商经营情绪低落，有些地方还出现过盲目排挤私商合法经营的现象。虽然1952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针对商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发布了《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对公私商业进行调整，但在贯彻《指示》过程中，仍有些地区落实不够，流通受阻，从而助长了部分省市粮价的上涨。

面对尖锐的粮食供需矛盾，毛泽东要求中央财经委员会拿出具体办法。中财委左右为难，提出了八种方案。后经过反复对比筛选，特别是借鉴苏联统制经济的做法，最后选定统购统销，即农村征购、城市配售的方案。在1953年10月2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时任中财委主任的陈云论证了实行统购统销的必要性，这一方案遂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和赞成。10月10日全国粮食紧急会议召开，旨在“从根本上找出办法来解决粮食问题”，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该决议于16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接着，11月19日政务院第194次政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统购统销的粮食政策开始在全国紧锣密鼓地实行起来。

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是当时不得已采取的一种办法。陈云在10月10日的全国粮食紧急会议上对八种方案的可行性逐个作了说明，指出：现在只能实行农村征购、城市配售之一法，其它的办法都不可行。但这样做，会使国家和农民的关系紧张，要认真考虑会出什么乱子。他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的是‘黑色炸药’，后面的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收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①但在当时的条件下，“粮食定，天下定”，解决粮食问题是我国成功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条件之一。正如1953年10月16日中央《决议》指出的：如果不采取统购统销这一步骤，“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严重的供销脱节的混乱局面，以至牵动全面的物价波动，影响整个的国家建设计划。”

由于当时把统购统销当作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社会主义措施，全党动员、全力以赴，

^①《陈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8页。

1953年10月部署的粮食征购任务，到1954年超额完成。据国家统计局资料，1953年7月1日至1954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全国实际粮食收入达到784.5亿斤，超过计划75.5亿斤，比上年度多收177.9亿斤，增长29.3%；国内销售粮食596.4亿斤，比上年多销135.3亿斤，也增长了29.3%。^①这



实行统购统销后农民将粮食大量卖给国家。1954年河北农民卖粮场面

样，购销相抵，库存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粮食危机似乎缓和了。

然而，形势并不容乐观。

由于粮食需求的不断增加，进入统购统销第二个年头的1954年，统购任务进一步提高。

这年6月2日，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控制粮食数字和掌握粮源的指示》，指出：“为使国家掌握粮源确有把握起见，在征购的方法上，小麦产区及早、中稻产区，均应在收获后及时进行夏征，并按比例实行随征带购的办法；在过去无夏征习惯的地区，可采取按田亩、产量、人口实行预征及派购的办法；大豆及杂粮，各地可视具体情况采取预征或动员农民交售的办法。”

6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给粮食部下达了征购计划：1954~1955年粮食年度，征收309.8亿斤，收购569.73亿斤，两者合计879.53亿斤^②，比上一年度增加了21.98%。10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粮食征购工作的指示》，规定1954粮食年度（即1954年7月至1955年6月）全国共应收（包括征和购）粮食878.09亿斤（这一数字与国家计委给粮食部的计划数字基本相同）。其中华北62.25亿斤，西北46.03亿斤，华东225亿斤，

^①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71页。

^②《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委给粮食部下达的计划指标》，1954年6月15日，引自杨继绳《统购统销的历史回顾》，《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



中南 220.24 亿斤，西南 127 亿斤，东北 168.83 亿斤，另加内蒙 28.74 亿斤。该指示强调，上述征购计划各地必须坚决完成，并力争超过。

这一强行征购的政策，立即催化了粮食危机的二次出现。

由于 1954 年的粮食统购任务要比 1953 年大，而这一年长江、淮河流域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洪灾，因而加大了非灾区的统购量^①，加之 1953~1954 年、1954~1955 年两个粮食年度的统购中，部分工作人员工作方式简单，方法粗暴，出现了许多强迫命令和卖“过头粮”等现象，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农民被逼自杀现象。这一切无疑加剧了农民和政府关系的紧张，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是受到严重打击。到 1955 年春，许多地方几乎是“家家谈粮食，户户要统销”，部分农村甚至发生了农民缺粮闹粮的事件，不缺粮的农民也和缺粮的农民一道，纷纷要求国家供应粮食。农村缺粮的叫喊声一时此起彼伏，粮食形势相当紧张。

以浙江为例，“除温州专区好一些外，其他地方统销很紧张，金华、建德、嘉兴专区更严重。龙游县直接为粮食供应饿死四个人，有数起农民偷偷把小孩送去政府，县委雇了四个保姆在养，省府派了一个工作组到区里，烧了饭被农民抢去吃了。衢州地委副书记，去开化县一个村了解，全村七十二户，只有三户有饭吃，农民吃树皮、草皮，脸色青肿。开化县一百二十六个村，这样情况严重的有三十九个村。农民说：‘共产党把我们当鱼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光了。’目前，全省一天销一三〇〇万斤，占农业人口百分之六十，个别县更严重。缺粮户，余粮户都好办，只是真假难分不好搞。”^②另一报告也反映了浙江统购统销以后的情况：“不少的合作社，向政府要钱要粮，‘中农不投资，贫农要预支’，坐吃山空。”“现在猪、羊减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卖家具，吃种粮，要饭，卖子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等现象已续有发生，逞不稳之象。”^③

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不得不于 1955 年 3 月 3 日发出《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开宗明义指出：“根据各地的反映，目前农村的情况相当紧张，不少地方，农民大量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春耕，生产情绪不高。应该看到，这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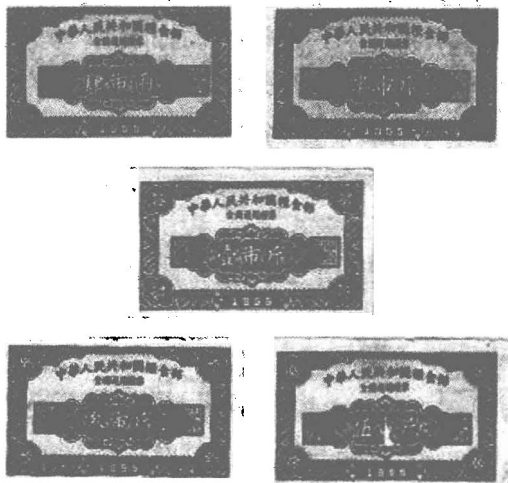
①1954 至 1955 年度在非灾区多购了约 70 亿斤粮食。

②《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吴植楦同志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55 年 4 月，载于《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年，第 323 页。

③《杜润生、袁成隆同志关于浙江省农村情况的报告》，1955 年 4 月 11 日，载于《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年，第 319 页。

情况是严重的，其中固然有少数富农和其他不良分子的抵抗破坏，但从整个说来，它实质上是农民群众，主要是中农群众对于党和政府在农村中的若干措施表示不满的一种警告。”《紧急指示》认为：“农民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对统购统销工作感到无底；感到增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对自己没有好处；感到购的数目过大，留的数目太少，不能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对于许多统销物资的供应，城市松，农村紧，也有意见。农民是现实的，如果他们觉得增产没有好处，就不再热心增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将会严重地影响农业生产，影响工农联盟，影响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我们必须做到既取得粮食，又能巩固工农联盟，既照顾国家的需要，又照顾农民的可能。”^①为此，《紧急指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制度，要求各地“在每年的春耕以前，以乡为单位，将全乡的计划产量大体上确定下来，并将国家对于本乡的购销数字向农民宣布，使农民知道自己生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留用多少，缺粮户供应多少。这样，使农民心中有数，情绪稳定，才有利于缓和农村的紧张情况，才使农民有可能订定自己的生产计划和安排自己的家务，才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才有利于国家有计划地控制粮食的购销。”^②《紧急指示》还将1955年7月至1956年6月的粮食征购任务由929.7亿斤减为900亿斤，后又两次核减，最后减为830亿斤。^③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前者对定产、定购、定销事宜作了详细规定，将“三定”具体到户；后者将市镇粮食统销凭证购买、按户核



1955年印制的全国粮票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76~77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77~78页。

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74页。